

第一章 在日本留学时期的革命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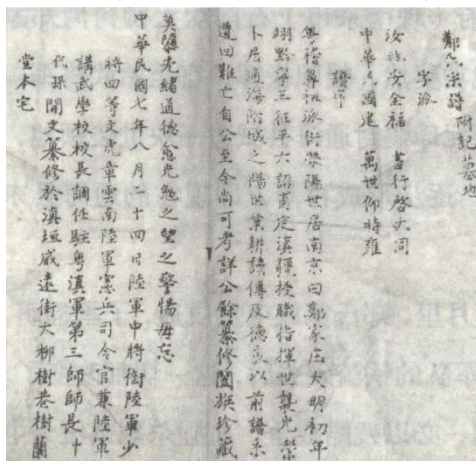
欲起神州文弱病，拼将热血溅泥沙。
头颅断送等闲事，一点泪痕一树花。

——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诗句

第一节 留学日本探寻救国之道

郑开文，字炳然，云南通海县郑家营人。郑开文曾于1918年8月24日，亲撰云南通海县郑家营《郑氏族谱》，开篇谱序曰：“粤稽鼻祖派衍荥阳，世居南京曰郑家庄。大明初年翊黔宁王征平六诏，甫定滇疆。授职指挥，世袭光荣，卜居通海附城之阳，世业耕读……”此资料表明，郑开文先祖跟随明初大将傅友德、沐英从应天府（现南京市）石门坎大柳树湾郑家庄出发，征战西南，平定六诏。因战功斐然，授职指挥，官至胎武将军，设通海守御千户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赐封通海县城边一块世袭领地，经过几代人的屯垦戍边，生息繁衍，逐步形成村落，即现在的通海县东村街道郑家营。

在明朝国祚延续276年的漫长岁月里，郑氏家族屯垦戍边，子承福荫，世代为官，耕读传家。但是，当满族军队的铁骑入关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历代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更替轮回，必以残酷战争，血腥杀戮镇压为主要特征。清初的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征服与抵抗是一部齐头并进、不共戴天的血泪史。仅在1645年就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而这两大惨案皆发生在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发人深省。“扬州十日”为清军占领扬州城后所为，因扬州军民在南明督师史可法的带领下奋战不屈，大挫清军锐气，满族将领都铎下令屠城，十日之内杀人八十万，史称“扬州十日”。难民王秀楚在《扬州十日记》中曾有过不亚于惊悚片的真实刻画：“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嘉定三屠”则因嘉定百姓反抗“剃发令”而起。清朝军队分别在1645年的七月四日、二十六日，及八月二十六日三屠嘉定城，“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



郑开文撰《通海郑氏宗谱》局部（毛笔手稿）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抗遭到更为血腥的镇压后，明朝的遗民们只有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或躲避于深山老林，隐其踪迹或蛰伏在荒岭乡村，敛息吞声。在清王朝统治的 200 多年里，郑氏家族始终秉持不仕清的理念，隐居通海郑家营。世代农耕陶织以维持生计，长年诗经礼乐的默诵以传承汉文化的薪火，精娴拳勇的锻炼以保留着强健体魄。到郑开文祖父一代，已穷困到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无法下葬的窘境。其时通海知县、师爷仰慕其气节，捐资买椁才得以安葬。

类似于郑开文家族的遭遇绝非少数，云南参加辛亥革命的著名将领大都有相同家世，如：思茅吕志伊，会泽唐继尧，腾冲李根源，墨江庾恩旸，昆明杨振鸿，镇沅黄毓成，云县叶荃等人，大多是明朝迁徙云南的遗民后代，这些身怀国仇家恨的年轻知识分子，被迫害被压抑了几百年，积累了太多的怒火。犹如炙热涌动的火山熔岩，在地下运行、奔突，迟早有一天，熔岩将喷发而出。

有人说，名取易代，天命转移，时代大趋势不可逆转，这些移民后代与清政权不共戴天，似乎有些太固执了。这其实是站在现代国家观念上的误解，爱国主义是有时代性的，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爱国主义。今天的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但是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却存在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那么属于不同国家政权的人民应该有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郑开文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夷变夏”的清王朝末期，他亲身经历了清政府统治所带来的贫困、痛苦、屈辱和前途无望；耳闻目睹了云南各地的农业、商业衰败，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英国占缅甸，法国占越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蚕食的目标，华夏云南再无一块安宁之地。至郑开文 1904 年留学日本前，清政府与英法两国订立多项与云南有关的条约，主要有：

1884 年 5 月 11 日，中法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1885 年与法国签订的《越南条款》。

1894 年与英国签订的《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

1897 年与英国签订的《续议缅甸条约附款》。

1903 年与法国签订的《滇越铁路章程》。

英法殖民者利用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云南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权、红河上游航行权、滇越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传教士自由传教权、开矿权等特权，并迫使清政府先后开放了蒙自、思茅、腾冲 3 个通商口岸。

举目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更是遭受一系列军事、政治、外交的失败，与各帝国列强签订了丧失主权、割地、赔款的条约：

（一）1881 年 2 月 24 日，中俄签订《伊犁条约》，内容包含有：中国收回伊犁九城，取消崇厚所签非法条约中割占伊犁南部大片领土，但是沙俄仍割占霍尔河以西的中国领土，俄占领了伊犁河北岸一片土地，使伊犁无险可守，失去战略意义。19 世纪 80 年代，中俄根据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了几个边界议定书，沙俄总共割占中国斋桑湖附近 7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二）1895 年 4 月 17 日，李鸿章代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廷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有：

1. 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2.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3. 赔款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

4.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驶入以上各口。

5.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

6. 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占威海卫。

(三)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同沙俄财政大臣维特、沙俄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中俄秘密协定》(即《中俄密约》，又称《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1. 日本如侵占俄国的远东领土及中国领土时，中俄两国海陆军应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

2. 在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期间，俄国军舰在必要时可以进出中国的一切港湾，当地中国官吏应以物品供应。

3. 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两省地方修造铁路以达海参崴，修路事项，由华俄道银行经办。

(四) 1896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根据《马关条约》签订：承认日本在华拥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日本取得在天津、汉口、厦门、福州、杭州、苏州、重庆设立租界的特权。

(五) 1898年3月，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国被迫“租借”于1897年11月20日被德国以武力占领的胶州。

(六) 1898年3月27日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顺和大连湾(两处已于1897年12月15日，被俄国舰队占领)及其附近岛屿和海面，“租期”暂定为25年。租借地的范围包括金州所属，租地以北至盖平为“中立区”，南满铁路由中东省铁路公司建造。俄国还在“满州”驻扎军队2.5万多人，把整个东北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并向长城以南扩张。

(七) 1898年6月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以法国租占广州湾威胁香港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占九龙半岛，以扩充香港界址，划九龙、深圳湾至大鹏湾的九龙半岛的全部，连同这两个海湾之间的海面，以及北纬22度9分以北、东经113度52分和114度30分之间的全部海面 and 岛屿，“租期”99年。

(八) 1898年7月1日，中英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英国租占威海卫、刘公岛及其附近岛屿和陆岸，租期25年。

(九) 1899年9月至11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分别向英、俄、德、日、意、法等国提出的所谓的“门户开放”的通牒：

1. 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投资和既得利益，其他国家不得干涉。

2. 各国运往势力范围内的货物，均按中国现行关税税率收税，其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

3. 各国对于进入自己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他国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之港口税；或由铁路运输他国货物时，也不得多收高于本国商品的铁路运输费。

(十) 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英、俄、美、法、日、德、意、奥、西、比、荷签订《辛丑条约》：

1. 赔款白银 4.5 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 39 年还清、年息 4 厘，本息共 9.8 亿两，另有各省地方赔款 2000 多万两（在 4.5 亿两的赔款总数中，沙俄抢到了最大的份额，多达 1.3 亿两，占总额的 29%）。

2. 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中国人不准在界内居住，由各国驻兵把守。

3. 拆毁大沽炮台和北京至大沽沿途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 20 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允许外国军队在北京和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 12 个战略要地驻扎。禁止把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运往中国，以 2 年为限。列强认为有必要时，还可延长禁运年限。

4. 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该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办“祸首诸臣将”，“停止文武各等考试”。

.....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以《辛丑条约》为首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令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层面难以动弹。此时的中国已经沦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内外矛盾日渐尖锐，危机四伏。但是，满清政府既不能保卫国土，任凭列强宰割，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一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摇尾乞怜，卖国求荣，维持其岌岌可危的政权。又强力摊派战争赔款，征收高额税赋，更加残酷压榨国内人民。

国势日蹙，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每个关心国家命运的士子都能深切体会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继而寻找挽救危亡的途径。历经以变革图强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与甲午战役惨败的惨痛教训，中国有识之士当然也想振作一番，想以推动中国社会的改良来力挽颓势。满清政府曾于 1901 年 1 月宣布“预约变法”，打出“维新”的旗号来推行“新政”，其中包括编练“常备军”，停止科举，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措施。此后两年间，又设练兵处，令陆军部编练新军 36 镇（1 镇即 1 师），其中派袁世凯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训练 6 个镇，作为皇家护卫军，其余 30 个镇分配到各省实施编练（云南为第 19 镇）。同时又令陆军部开办一系列军事学校——在威海卫设立海军学校，在保定设立军官学校，在青海、西安、武昌、南京、云南等地区设立武备学堂、陆军中学堂和陆军小学堂。为利用好新办的军事学校和增设的军事资源，建立新的武装力量，急需培养一批新的军事人才充实到国家机器中。清廷命令各省选拔优秀学生，派遣到日本士官学校或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技术，以便日后回国参与指导各级军事机构和部队。

中国人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竭力输入西洋文化，每能去芜存菁，取精用宏，因而相信若通过日本学习西洋文化，可获事半功倍之效。且游学日本又有路近、费省、文同的各种便利。故甲午战争之后，举国上下，莫不视游学东瀛为富国强兵之要径。但云南地处边疆，社会风气闭塞保守，滇人虚骄自大的心态犹未消泯，以致学取西洋近代文化，大力培植人才仍不为社会所重，其求存图强成效亦微。

郑开文年轻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也有跟着马帮走南闯北做生意的经历，见多识广，对清末国势衰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惨痛现实感同身受。他认识到，要救民于水火，军事收效最快。基于这一认识，他报考官费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第一选择为“日本陆军大学”，后因日本国不愿意中国人进入培养高级将官的陆军大学，遂改入日本为培养陆军中级官佐的士官学校。郑开

文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的信念十分明确：“学习军事，以救国自任”。同期去日本的大理留学生周霞说：“睹国势之日弱也，欲以医人之手医国”。会泽留日学生黄毓英认为：“立国大陆，非武不足以图存，决计就学陆军”。会泽留日学生唐继尧说：“乘长风破万里浪，男儿壮志也，何惧为！况负笈异邦，学成救国，正吾辈今日之责”。均表明这些品学兼优的云南学子，留学日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国，更以“大丈夫不能如班超立功异域，亦当学马援愿战死疆场，以马革裹尸。日事毛锥，老死牖下，不几负此七尺躯耶”的情怀而自勉，表现为强武兴邦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受历代戍边守土军人诗词的影响甚深。

郑开文启蒙读书的经历，说来亦不甚简单。据《通海县志》记载：“郑开文天资聪颖，体格健壮，少负大志，读书刻苦用功。”年稍长即入郑家祠堂义塾就学，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能背诵及将字大半认识后，即读四书（四书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进入开讲、作文、作诗、课试。那时的私塾、义塾先生大都须有功名，学问好才可设馆授徒或者上门讲课，也懂得读书考八股文的门道。先生按年龄大小，每日教新书由四五行起，渐渐加至四五十行。每日先生将新课口授一遍，即由各人熟读，明晨向先生背诵，背新书带温旧书，日日读新温旧，毫不间断。且当时师道尊严，倘背不出，先生要责罚的，轻者用薄板打手心，戒方打头，甚者用藤条打屁股。老师的责罚倒是小事，但从小就体格健壮、个子高大的郑开文却丢不起这个脸，每晚都要读诵背熟方敢睡觉，是以被责打尚少。

试想当时计算的年龄，又是虚龄，照现在说是由5岁到15岁的孩子，要读如此多的书，而四书五经要能背熟，略知讲解，岂不难为。其实每日皆不废读，长年累月的坚持，养成习惯，是可以做到的。郑开文是家里的长子，有兄弟五人，为了给弟弟们做榜样，仍能将勤补拙，笨鸟先飞，不敢偷懒贪玩。郑开文聪颖异于常人，过目不忘，书读二三遍即能背诵如流。时间一长，倒也学业精进，无论诗文辞赋，一学即会，作文亦能灵活运用，文字精彩动人，颇得先生赞许。

四书之后，继开读五经，即《诗经》《尚书》《易经》《仪礼》《春秋》。背诵之法，与四书略同，但是读经文还要读注，解释必须依朱熹的注，故读正文时亦要读朱注，由头至尾全部背会方止。因当时功令考试八股文的题目，均在此范围内出题，若参加乡会试第二场的题目，则每经书必出一题，故此“五经”是乡试的重点，亦为试举考试的基础，要读到滚透烂熟。四书五经外，兼读孝经、公羊传、谷梁传、周礼、尔雅，间带读五、七言的唐宋小诗及声律启蒙，学作对句，学调平仄与十七史蒙本。蒙本是每句4字，每2句1韵，句句皆有史事以记典故。所涉及各种书、诗、典故都要背诵，还有兼读带读之法，如读左传兼读公羊数行，带读唐诗蒙本数句等，故四书五经读完，而此等书亦随之读完。

幼年的学习还有最重要的课程，就是习字，从开蒙到课试都十分重视习字。启蒙初写描红，描红本子，是印成“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等等，红色半寸大的字，每半页3行，每行6个字，令小学生用墨笔在红字上连续照描，描熟以后，即写仿格。仿格是将字用墨印成，套在白纸本内摹写，格子由善书者随意择字，或写格言，或写诗句等，惟必须楷书，由大而小，大者每半页两行，每行4字，每字约寸半；小者每半页8行，每行8个字，写熟以后，即写小楷。小楷是用印成有红线的红直格纸，每半页8行，每行20或25个字，取法帖对临，每日写数行，不可间断。写就交先生阅看，好者加圈，劣者加杠，字的优劣与考试成绩有直接关联，童而习之，

至壮不废。

15岁以后，郑开文就读通海秀麓书院（今通海一中）。书院是通海县的最高学府，其经费主要为县学田租谷。入书院就读的生员年龄悬殊、程度参差，学无年限，以科举取中为结业。书院的教材为四书、五经以及历代文选、名家史论、诗赋等。不但要读八股文、古文、律赋、文选之类，并要看史书如通鉴、四史、子书；如庄、老、韩非各种书籍，俾腹中充实，以备作文的驱遣。教学形式仍以读、背、习字和结合进行作文、作论、作策、作诗、作赋以及课试，学作八股文，诗、赋、策、论等。通海秀麓书院设主讲（又称山长），由知县聘请品学兼优的进士或举人担任，是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为人正派者的荣誉职业。秀麓书院山长（校长）长期执掌教鞭，深谙为学之道，设课讲学别具一格，往往不按常规设经史诗赋策论等应试课程，而是随受业者之需求而施教，相当于今日之课外讲座，针对学生各科知识的短缺而补习。山长每月讲书一、二小时，以八股文考试为主线，带讲经史诗赋或策论等，论及每一主题，则前后贯通，旁征博引，并涉及历朝历代应试文章，融通汇合予以剖析，评论其科举考试文章之得失。这种不拘一格的讲学方式，颇受那些屡举不中的秀才们的青睐，四邻八方的青年才俊大多拜其门下，为通海县城学界之盛况。

同时，秀麓书院山长专设每月一考的项目，即以经、史、诗、赋为主出考题，实质就是命题作文。考题悬于馆舍门口，馆内外生员都可以参加考试，按规定时间内呈交先生评阅，由先生圈点批改后，选优秀习文贴墙或廊柱之上，使众人观摩。特别之处，秀麓书院山长对中意的诗赋、策论等往往自费钱财刊刻登载，以为本县学子临摹之本，对于屡中首榜的优秀诗赋文章还奖励膏火银1-3钱。家境贫困者得此奖励，可藉此抵冲部分书纸笔砚的费用。故，郑开文对于应试命题作文乐此不疲，坚持每月应考，竭尽全力去做。白天需要应对日常的功课作业，甚少读书的时间，而读书、作文总在深夜、清晨。为节约每天上学来回走路的时间，郑开文曾一度自搬行李在秀山上寺庙寄宿，自己拾柴烧火做饭。郑开文1916年题秀山公园海月楼楹联有“最难忘灯火几时，风雨寄亭朝煮粥”之语，就是其时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

概括言之，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读书的功利性直白，一层一级的读书考功令是贫寒子弟改变人生处境的唯一阶梯，多读少读，在乎自己的用功。查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得知郑开文去日本留学前的学历为增生，曾经“三赴礼闱黜而不售”，因而愤然“弃毛锥，抛帖括”，转而参加云南考选官费留学日本，从此弃文习武。留学归来时，通过北京“归国留洋学生考试”，成绩优等，获得陆军步兵科武举人称号。

郑开文青少年时代刻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博闻强记，累积深厚，其诗赋律韵，辞格文章、范文典籍的知识大多已刻入脑海，终身不忘。在尔后的几十年，由于军人职业所限，他长年奔波各地，南征北战，军政事务繁忙，不可能有书籍资料随身携带。但是经他起草的函电文章、诗词楹联、诔章挽词，大多韵格周正，引经据典繁密且准确。说事论理逻辑清晰，条分缕析至详。涉及军事、政治、哲学、人文、历史、地理、科学、法律、岐黄堪舆等知识，完全靠他年轻时博闻强记的积累才应对裕如。例如，郑开文在民国元年率军援藏平叛期间，向上海《申报》发送《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撰写此电文时，郑开文身在德钦前线，不可能查找资料或身带历史典籍，完全是凭借平时积累的滇川藏边务历史沿革、地理变迁的知识，真凭实据地驳斥了袁世凯等人以阻碍滇军入藏作战而篡改滇川历史沿革的谬论。其为巩固国防、边务兴革的远谋深虑，格局宏大

而不失脚踏实地，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此顺便澄清与郑开文有关的一个情况。通海县有民间传说、文章多处提到赵咏周是郑开文老师的说法。赵咏周，字以南，1870年生于通海县城，光绪17年中举，后聘为南宁县教谕。有件清朝宫廷文牒，大致可以勾勒赵咏周为学为官的经历。《清实录》四百〇五卷载：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五月己丑朔

谕内阁：云南学政姚文倬奏考核职，恳恩奖励等语。云南丽江府教授钱鸿逵、东川府教授赵永昌、江川县教谕王京诏、南宁县教谕赵咏周、选用训导周汝康，以上五员据该学政声称，学行俱优，均着照所请，赏给内阁中书衔，以示鼓励。学政保举教官，原为激励人才起见……^[1]

云南省南宁县于1913年改称曲靖县，南宁县教谕必是通海人士赵咏周无疑。云南学政保举南宁县教谕赵咏周为“从七品官内阁中书衔”，表明赵在南宁县当教谕有些年头了，学行俱优，劳绩需酬。亦可见，赵咏周此时官眷正浓，前程无量，且家中开有通海县著名的“和美斋”商铺，家境富裕，无须当一个冬烘先生养家糊口。郑开文，1876年生于通海郑家营，仅比赵咏周小6岁，为同辈之人，包括上述清廷文牒提到的“云南丽江府教授钱鸿逵”，1905年与郑开文同在日本留学并担任留日学生的监督。所以，郑开文发蒙的年代没有可能与“退养在籍”的赵咏周有师生之谊，这里一并予以澄清。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云南选考官费留日学生，郑开文即以增生资格报名应考，与唐继尧、叶荃等二十多人同被录取，遂以官费赴日学习军事。郑开文选考官费留日学生资格是从临安府（现建水县）开始的，考试的内容是什么？考生的水平怎样？笔者始终没有找到郑开文当时的考卷，仅以临安府同时资送的学生张光灿的府试考卷和恩安县（现昭通县）廪生姜思孝的县试考卷为例，一窥考生们的思想认识、知识结构、文化水平。

临安府的考题是《张骞通西域始通滇国论》，考生张光灿写道：我朝康乾之际，征青海，征回疆，征准噶尔，征缅甸、大小金川，九夷八蛮罔不来宾。当是之时，英、法、德、俄诸强国，未闻有要挟我、迫胁我，开我口岸、占我租界、割我边疆者。嘉、道以还，蒙业而安，不欲与四夷生事，而炎炎然迫我来者，联袂接踵矣。然则待人通我，而我已不堪，何如人未通我时，而先发以制人耶？苟徇目前之害（按：即兵祸战争），遂昧昧于万世之利（按：即教育），此苟且晏安，庸懦无为之主之为也。

评卷官吏给他的评语是：“论古有识，笔亦振拔，能达其所见。”^[2]

恩安县廪生姜思孝参加县考时的文章题目是《勾践卧薪尝胆论》，他写道：

观古人之事实，贵得其心迹，观今人之富强，贵察其精神。不得其心迹而取其事实，不察其精神而羨其富强，是所谓南山有鸟，北山张罗也。……犹观今人之富强者，不可不究其精神，知其精神命脉之所在，则凡人所欣羨而乐道者，皆可缓其所缓，而急所当急焉，斯得之矣。古今之事变何穷，所贵观其通也。日本维新数十年而强，其变法次第，试悉数指证，以资借证。策人才致于一朝，彼得变政而兴，兵学重于全国，维廉中兴而盛。征之环球各国，莫不以穷则变，变则通者。一改弦更张，而功烈耀于天下，雄武遍于国中，然究其次第，终不能如数家珍，有条而不

素者……日本维新：明治元年，定官制，设学校，译西书，海军陆军一时并举。二年、三年，向时改订，不厌求详。四年，定新律，设报馆。五年，修铁路书肆，厘定学校章程，能涉猎历史者，无不津津乐道之。中国借证于此，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开商埠，兴工艺。官制、军制，凡足致富强者，无不改之惟恐不速。变法之得其序，故足以致强，而所以致强者，当要不尽在于此也。日本岛国，人皆短小而悍，尚勇之风自昔已然。明治跃起之日，正私行游学者回国之时，而三条、大久保等，又皆一时之人杰，乘本国之风尚，取各国风尚专长，十有八年间凡大变，进境之速，日新月异，彼徒观其表面者，乌得而知哉？要之一代之兴，必待乎其时，尤必乘乎其势。中国欲借鉴于日本，变法之序，已无大异，而其所以能成今日之日本，得机得势，咸震惊其变法之效者，实表暴于中日一役。而当日之灭琉球，扰鸡隆者，又所谓因变法而蓄机养势，养成中日之役之原因也。中国讳言战，谓有伤于天和，而各国谓经一番战争，开一番文明。吾谓竞争时代，斯言信不诬也。何则？今日言变法，必鉴于人之行而有效，日本是也。而试问日之得跻于头等之国，振起全国之风气，鼓动一时之人心者，不变法不能致强，仅变法遂能鼓舞人心，通国以见侮于人为大辱乎？中国而既变法矣，诚能蓄我机势，育我人才，坚韧势力，觊一大而侮我之国，出全力以博一胜，则人心振而国势立，以此为借鉴之资，乃所谓遗其貌而取其神者也。虽然必谓日本变法，而谓为无次第之可借鉴，是又言之过激也已。^[3]

由此可见，应试者熟谙时事，对日本维新变法的历史了然于胸，了解清政府的新政，明确中国应以日本为榜样进行变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科举考试已改八股文为时务策论，因而从两考生谈古论今的文风来看，已与以前千篇一律、忌谈时事的八股文有很大的不同。在文章中，两生针对时势，各抒己见，品评时务，对答切中要害，举例得当，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第二节 参加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生涯的起始

郑开文等人于1904年7月1日离开昆明，长途步行至贵州镇远后，才坐上木船至武汉、上海，由上海换乘海轮，1904年9月抵达日本东京，进入日本陆军部开办的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同年12月，即与黄兴、宋教仁等百余人组织“中华革命同志会”，参加到一场轰轰烈烈的“驱除鞑虏，恢复汉室”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中。对社会现状不满，一个人是牢骚，一群人的牢骚可能是造反，一群人有牢骚想造反，并且有了完整的组织、政治纲领，那就是革命。回顾那时大多数年轻知识分子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动机，主要是从清朝政权压迫汉人的仇恨出发的。经年历久的愤恨达到极点，人人都想造反，尽力鼓吹发动革命，复我河山。正如时人所言：“我辈生逢乱世，未复民权，数百年压制之恨难消，兆亿身骨肉之冤莫白。非有革命，不能荡涤汉人屈辱。”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先生正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虽然当时也许只是少数人了解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但是完全切合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政权，光复中华的诉求，因此有一呼百应，人人景从的效果。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纲领从此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灯塔，指引了人们前赴后继的革命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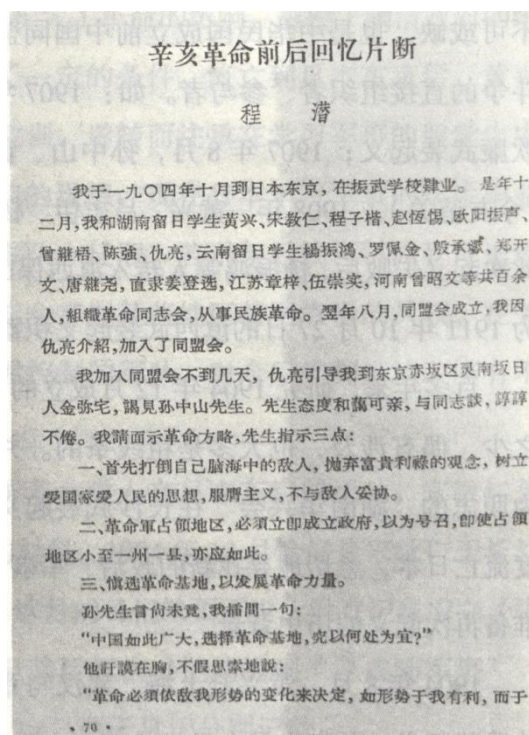
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先生著有《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段》，文章记载：

我于一九〇四年十月到日本东京，在振武学校肄业。是年十二月，我和湖南留日学生黄兴、

宋教仁、程子楷、赵恒惕、欧阳振声、曾继梧、陈强、仇亮，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罗佩金、殷承瓚、郑开文、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伍崇实，河南曾昭文等共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4]

程潜先生五十多年后仍然记得那个激情燃烧的夜晚，那些充满热忱，执着地要以血肉之躯来拯救危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战友们，真的让我好感动，也让我们第一次看到郑开文的名字出现在中华民族民主革命先驱者阵列。程潜先生与郑开文在清末民初有过多次交集：在日本振武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步兵科的五年是同窗好友；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程潜同学是参加武汉保卫战的作战参谋，郑开文同学是率部攻克南京后任陆军部军学局代理局长；1916年护国战争中，程潜同学担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是从广东筹集队伍向湖南进发的，郑开文同学此时担任广东都督府军政厅厅长、军务院第七军军长，在经济、武器装备、人员诸方面给予程潜同学的援助是不可言说的秘密；在1919年护法运动中，郑开文担任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与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广州军政府陆军部次长程潜先生在道义上、战场上相互应声，为护卫他们心中最美好的“民主共和”而南北征战、血洒疆场。人世间有什么样的友谊能与此相媲美？

程潜先生回忆录的坦诚、客观不容置疑，并作为史料被史学家所采用。国民党党史和其他革命元老的回忆录中也有“中华革命同志会”相关内容记载。可惜的是，这个组织的纲领以及活动情况，参加者的具体人数，稀见研究者和其他当事人披露。



程潜回忆与黄兴、宋教仁、郑开文等人于1904年12月在日本东京组织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文章。

程潜先生《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段》记载表明，郑开文投身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时间是1904年12月，早于其加入中国同盟会的时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大多数成员转入同盟会，顺理成章成为同盟会开展军事工作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中国同盟会内“丈夫团”的核心成员。“丈夫团”实为同盟会中学习军事同志“盟中加盟”的秘密团体。团名取孟子所言：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丈夫”的意思，用以激励会员们的意志，培养气节。其成员有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黄恺元、叶荃、温寿泉、曾继梧、华世中、刘洪基、程子楷、孙方瑜、曾昭文、耿觐文、李干骥、仇亮、杨曾蔚、陈强、孙荣、高霁、杨源浚、殷承瓛、袁华选、陈之骥、姜登选、李浚、王孝缜、何澄、王家驹等。^[5]

有限的名单中虽然没有列入郑开文、欧阳振声、杨振鸿、罗佩金、唐继尧，章梓等前期“中华革命同志会”诸人，显然有组织交织、功能重叠的情况。但这些人员作为中国同盟会早期军事骨干的作用、地位依然不可或缺，也是中华民国成立前中国同盟会组织的所有武装起义和军事斗争的直接组织者、参与者。如：1907年3月由黄兴等人统率发动广西钦廉武装起义；1907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组织攻打广西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1908年，黄兴、吕志伊、杨振鸿等组织云南河口武装起义。此次起义失败后，杨振鸿等人转入滇西保山、腾冲一带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为1911年10月27日的滇西武装起义积蓄了革命力量。

百多年来，研究1904年12月成立的“中华革命同志会”的文章非常之少，偶有涉及，也大多是粗线条的。并没有注意到，以推翻满清政府为职志的“湖南华兴会”在长沙武装起义失败后，黄兴、宋教仁等人再度流亡日本，急切地寻找新的政治、军事、经济资源，以重整革命力量，准备再次起义的历史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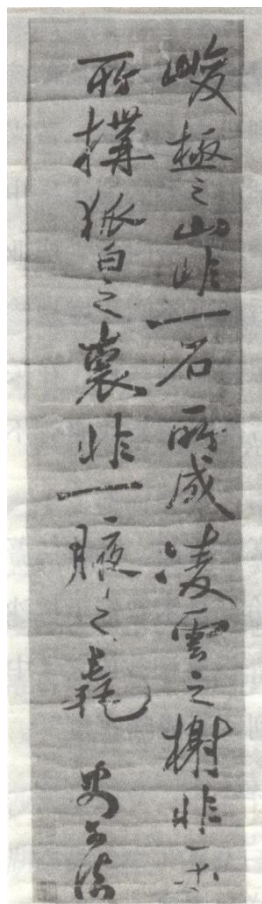
1904年8月，黄兴赴上海、武汉与章士钊、陶成章等人筹划策应长沙武装起义，预定十月十日，趁慈禧太后七十生辰庆典时发动。当时认为湖南的学生、军队已经联成一气，组织、计划、经费、枪支弹药大体落实到位。黄兴、宋教仁等人乐观认为革命力量足以爆发局部战争，攻陷县城，取得胜利。但是，现实情况与不严谨的“认为”相去甚远，会党、哥老会、江湖游击方式的群众运动肯定不适合敌强我弱的残酷现实：学生界的力量还很幼稚，新军既未成立更谈不上训练有素，旧军队也没有完全运动妥帖，已经联系好的马福益、游得胜等会党、群众参差不齐。由于缺乏经验，马福益、游得胜等在萍、浏、醴一带的旧军队中出入频繁，人多口杂，以致风声透露，被反动当局侦悉底蕴。同时，马福益部下有一人在醴陵车站被捕，供出一切机密，并说出这次起义的首领是长沙黄廪午（黄兴）老师。于是长沙府、县衙门开始在省城搜捕革命党，并悬赏缉捕黄兴和刘霖生、宋教仁等，华兴会的秘密机关多数被破获，储藏的武器也被查抄，长沙武装起义功亏一篑。

这次起义虽未成功，但是它扩大了革命的影响，震撼了满清政府的统治，为尔后“浏醴之役”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流亡到日本东京后，黄兴鉴于自己组织长沙起义失败的教训，遂转而注重在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中培养军事骨干。按黄兴、宋教仁的设想，现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学生毕业以后回国，大多数会在清政府军队中任职，若干年后就可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军队的各个层面，有些可能会掌握某些地区甚至省份的兵权，在关键的局部或大部有革命党人掌握控制的军队，对今后推翻满清政府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研究中国同盟会建立前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的活动，宋教仁著《宋教仁日记》是本极其难得的材料。1904年12月恰好是宋教仁于长沙起义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时间，这月的日记缺页不少，没有记载成立《中华革命同志会》会议的情况，但其后两次日记均提到“速成陆军事”。宋教仁1905年1月24日、2月28日两天日记分别记载：

(24日)未正，至卧龙馆黄绩臣处，会议组织速成陆军事，坐良久。程润森（江苏人）、平山周（日本人）至，罗子云等与程润森议不合，乃未决议而散。

(28日)午初，至周海南寓，问以程润森组织速成陆军事究竟若何？渠答以犹待商酌云。未初，至罗子云寓。未正，回。申正，彭希明来，要余至山本馆刘霖生处，晤黄庆午、章行严，会商一切事件。^[6]



郑开文收藏的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书法条幅。

可见，1905年初，作为华兴会主要领袖宋教仁先生忙碌的事情有两件：筹备出版《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和筹备速成陆军事。两次记载有关速成陆军事，绝非偶然，应该看成是“速成陆军事”工作的后续跟进。黄兴、宋教仁亲自发动和组织在日本士官学校、日本振武学校等军校里学习军事的精英分子，单独成立“中华革命同志会”，突出军事进行和培养军事人才的功能，这就是被史学者称为“黄兴军事班底”的发轫。黄兴在日本代理同盟会总理时期，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比较多，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学生不下百余人，他以为学军事的留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者的真面目。因此，他嘱咐学军事的同盟会会员不与同盟会总部往来，不参加公开的宣传、鼓动活动，这些人的入盟证件也由黄兴一人独自保管。届时，孙中山先生不常在日本，国内外同盟会组织都与黄兴直接商讨问题或通信联络，他和同志间的感情也就深厚起来。黄兴是一个爱国的血性男子，平时沉默寡言，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革命同志的衷心爱戴，与他共事的人都会被他人格所深深吸引。因此，留学生与黄兴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对待同志战友特别有感情。当时参与“中华革命

同志会”的成员大都是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为挽救危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推翻清封建王朝，建立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兴国家的志向，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上述“中华革命同志会”名单中提到的18人中，黄兴、宋教仁是华兴会党魁，伍崇实是学习矿产的学生，其余15人均是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显然，这是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比较正规的准军事组织。若以1912年1月9日成立的中华民国陆军部为标识，回头看看当年“中华革命同志会”诸君的身份变化也颇有趣味：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军衡局局长仇亮、军学局代理局长郑开文、军需局局长曾昭文，以及欧阳振声、曾继梧、章梓、陈强等也都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名重一时的革命军将领。另外在全国各地还有：武汉保卫战作战参谋、湖南旅长程潜，武汉保卫战作战参课程子楷，湖南援鄂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云南都督府军政厅厅长罗佩金，云南都督府参谋厅厅长殷承霖，云南都督府参谋、军政部次长、云南北伐军司令唐继尧，四川军政府参谋总长姜登选。可见“中华革命同志会”的成员构建了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的班底，其成员组织、筹办、领导各时期的军事进行，在辛亥革命前后数年间，为建立、保卫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节 鼓动、宣传民族民主革命与创办《云南》杂志

笔者家里藏有一幅三百多年前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将军题为“峻极之山非一石所成，凌云之榭非一木所构，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的条幅。据外婆说这是郑开文生平最爱之物，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中，都随身携带着。每临重大战役或血战厮杀的阵前，他都会先找个地方坐下静静，翻开随身携带的字画，细细品味欣赏一番，似乎就能得到无穷的智慧、力量。以至于这条幅皱褶不堪，水渍、汗渍，抑或是血渍的浸染而斑迹漫漫，呈现出苍劲古老的样子。

史可法手笔条幅的寓意，在冥冥之中与清末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相契合。辛亥革命是以千百万中国人不断觉醒和顽强斗争以改变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面貌为特征的一次伟大运动，郑开文正是这千百万人中一员。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需要激情、智慧，需要不惜流血牺牲的勇气，更需要千百万人聚集在一起，坚韧不拔地完成各项具体的工作，成为象征中华民族的“凌云广榭”之一木，“峻极之山”之一石。

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之途无非两端：一、政治、舆论的宣传；二、军事、武装斗争（包括武装起义和暗杀）。革命必须唤醒民众，提出革命的政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抢占舆论宣传的先机。云南民族民主革命先驱们就是从创办《云南》杂志开始闹革命的。谈及为何办《云南》杂志，云南留学生说：滇事之危急，改良思想尤为切要。而“输入思想，厥道有二，曰学校，曰新闻杂志”。办学校收效缓慢，且一时难以普及，中年人、老年人又无暇参加。若新闻，若杂志，则以文明高尚之思，环球治乱之故，日日噪聒其耳，刺激其心，使阅者如亲承恳切之教，心领神会，如足履文明之土，耳目一新”，“熏习既久，潜移默化，收效自丰，因而有是编之出。”《云南》杂志以“改良思想”、“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为宗旨。而思想之要，又有诸多方面，如国家思想、团结思想、公益思想、进取思想、冒险思想、尚武思想、实业思想、地方自治思想、男女平等思想等等。《云南》杂志正是着意这些社会关切的热点，内设图画、论着、译述、时评、小说、传记、文苑、杂纂、调查、大事月表等栏目，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法律等诸多领域，“或

正论，或旁击，或演白话谋普及，或录事迹作实证”。

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有：

第一，陈述了法、英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事实，揭露了它们的侵略野心，号召云南人民群起抵抗，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据统计，关于法、英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论说、时评、译文、史料、通信和调查材料等项，始终是《云南》杂志的主要报道内容，约计有 80 篇 40 万字以上。其中以刊登在《云南》杂志第一号《英法军事协约问题》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尤为鲜明，揭露了法、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缔定条约，划分势力范围、分割我云南的真相“是将挟此无形之攻守同盟，挟此平和之侵略政策，于东方殖民之根据地，以实行其扩张领土之野心也。呜呼！我云南何不幸而适当其冲”。其唤醒民众奋起救援云南危亡的途径和方法也非常贴近现实：“我千余万同胞，其奋然起，举教育军事工商路矿各政，以至迅疾之力兴办之，使有猛虎在山之势。则彼虽百其协约，其如我何。否则除非我滇人尽死也”。

第二，揭露了清政府苛虐百姓，媚外残民的种种罪行，号召全滇人民团结一致，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占了杂志的较大篇幅。

第三，宣扬资产阶级国家、民主主义的思想，表达欲在清廷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

第四，从爱国爱乡的热情出发，介绍家乡的历史文化、物产资源，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云南》杂志文章编辑定位也以“非仅商榷学术、启发智识之作，实为同人爱乡血泪之代表；非激越过情之谈，实不偏不颇具有正当不易之宗旨；非草率无责任之文，实苦心孤诣抱有绝大之希望者”。努力做到“东鳞西爪，尽足钩稽；断简零篇，亦寓深意”，“是云南前此未有之创举而今日之救亡策”，“是故乡父老引领翘足朝夕期待者”，“是留东同人枯脑焦心日夜经营者”。留日同人欲借此杂志“激来太平洋上之潮，洗净陈陈脑髓；树起昆仑山顶之旆，招归渺渺国魂”，达到有朝一日“民德日新，百业蔚起，内足以巩国基，外足以御强敌，云南复为云南人之云南”之目的。

《云南》杂志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创刊，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后停刊，历时近 5 年。期间两次因故停刊，共发行 23 期和周年特刊《滇粹》一册，是当时留日学生界地方刊物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种革命刊物。其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一万册，是同时期仅次于中国同盟会《民报》的发行量。它的发行，受到云南人民的热烈欢迎，有“读者快之”和“读之令人感奋”之感，以致人人“争而阅之”。越南同志捐款来函曰：“自疗毒拔除以后，吾滇渐有一线生机。自杂志出现以来，吾滇复多一分希望。滇乎滇乎，其终为法属地博览会之参考品乎，是在滇人自为之。同人留亡国之墟，受尽无穷刺激，历徧极惨悲观。对哭新亭，久挥无泪。辄欲以区区绵薄之力，为吾滇谋万死一生之计。凡吾滇生死问题，无不竭其愚诚，作诸君之后劲，冀以收万一之效果。而对于杂志事件尤为注意。当诸君发起此事之时，同人等闻之，咸惊喜而走相告曰，今后吾滇如添练二万新军矣，我辈宜如何怂恿之，赞成之，以速此举之成。”

《云南》杂志的发行和广泛传播对云南的影响是巨大的。仅发刊 1 年，就使云南人“群知外患之迫切，岌岌莫可终日。国民责任，无或旁贷。或议收回路矿，或为保卫权利，或筹谋自治，或监视官吏”。云南人在其他各省同胞心目中的形象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各同胞看来，云南已

由“无起死回生之望”，一变而为“人心尚未死尽，或可图存万一”，于是相率“救云南人以救中国之声，遂充满于社会”。至于英、法等列强，则是惊恐万状，先是“出巨金贿赂当道，使之封禁”，计划落空后，不得已“用该国文字译出，以致伦敦、巴黎间之报纸，竞相鼓吹曰，云南人醒矣，云南人醒矣。”

刊登于日本东京出版发行的《滇话》第二号《云南同乡会第四十一次例会兼欢迎会》的一位云南女性李巽如的演讲，更能直白表明《云南》杂志创办一年的作用和影响：“（李）巽如在家乡的时候，早就听见诸君热心桑梓，为国忘家，一举一动，都是于云南大有关系。譬如丁振铎，他若是久居云南，那云南一定是要亡在他手里的。全得诸君之力，方才把他调开，这是最大快人意的。又如，云南人将来恐不免做法国的奴隶，世界万国都是知道的，独云南人一点也不知道。自云南杂志一出，云南人方才如梦初醒，知道法国人的利害。而法国人也就深为注目，竟自将云南杂志都翻译成法文了。足见诸君的气魄，诸君的热诚，诸君的才略。那稍为有点知识的人，都是五体投地，佩服的不得了。”^[7]

《云南》杂志积极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为云南人民的觉醒，云南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涨，以及对云南的“重九起义”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有“云南光复，《云南》杂志宣传革命之功不可没”之说。

1958年《云南杂志选辑》出版时，曾是创办人之一的李根源先生为其写了序言，把《云南》杂志创办过程做了详细的叙述，尔后的研究者、学家，一直是以这个版本向世人宣讲的。为了说明问题，需要全面揽引这段话：

……其时，孙黄两先生为扩大宣传革命，又号召各省留学生筹办地方刊物。丙午年（一九〇六年）一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刘揆一、匡一、两君约云南革命党人杨秋帆（振鸿）、赵直斋（伸）、罗镕先（佩金）、吕志伊（天民）与根源五人暂留，谓孙黄两先生有事相谈。孙黄两先生向我等提出办《云南杂志》之要求。孙黄两先生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及，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袭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8]

回溯这段时间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的活动，综合参考各方面的材料，笔者认为这段话中提到的时间、出席人物等是有问题的。

文中主要人物之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10月7日由日本横滨赴越南进行革命活动。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三十八年10月7日神奈县报，秘第2047号载：“清流亡客孙逸仙于本日上午9时从本港乘法国邮船‘加利都尼亚号’出发，经上海去香港。”^[9]至1906年4月24日由法国返抵日本横滨。宋教仁1906年4月25日日记记述：“下午至《民报》社，谈次，始知孙逸仙已回东，今日当来社云。未几，孙逸仙果来，言此次自欧洲而新加坡而香港始来东者。谈良久，遂留晚餐”。孙中山1905年10月7日离开日本横滨至1906年4月24日回横滨的过程，这在《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等权威性研究文章中均能找到证据。

文中主要人物之黄兴先生，据《黄兴年谱长编》《黄兴文集》、其子黄一鸥著《黄兴回忆录》

等权威性研究文章披露：黄兴于1905年11月离开日本东京，去香港、越南、广西等地进行活动，联络革命同志，筹划广西、云南等地区的武装起义，至1906年冬才回到东京。

召集人刘揆一，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的时间是1907年1月7日，1907年3月1日，接替宋教仁，代理黄兴庶务之职，成为中国同盟会本部主要负责人。刘揆一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1903年3月，在留学日本的热潮鼓舞下，刘揆一自备资斧，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在那里，他结识了黄兴，二人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的途径，一致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因为清廷腐败无能，要救亡图存，首先要推翻清廷的统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非武装起义不能成功”。留日期间，他和黄兴、秦敏鏊等发起组织成立“拒俄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带有排满性质。清政府公使请求日政府禁止，旋改名“军国民教育会”，刘揆一曾在该会“学过军旅之事，参加过行军、射击的训练”。黄兴从宏文学院毕业后，自任为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决定归国策动反清武装起义。临行前，垂询刘揆一革命进行方略，揆一答称：“言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多可赞叹”。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刘揆一因不愿放弃华兴会的工作，没有及时入盟，但他仍在潜心研究革命理论，时刻关心着“湖南风潮的起落”。在此期间，他接触到大量日本翻译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又通过阅读《民报》，使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认识到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与他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认识到孙中山“对欧美的民主政治有精湛的研究，他先进的革命思想体系决定了他有资格成为同盟会的当然领袖”。而就在此时，引起他思想上强烈震动，极大激发他的革命热情并终于直接推动他加入同盟会的就是萍浏醴起义事件。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刘揆一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多次找宋教仁、黄兴商量，“欲归国起事，或往助湖南之事”，由于黄兴“不劝其去，谈良久遂罢，而不果行”。起义失败后，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道一（刘揆一的胞弟），12月31日被清吏杀害。由于交通阻滞，直到翌年1月22日，刘揆一在东京收到家信才得知这一噩耗。据宋教仁当天的日记记载，宋到刘寓所访问时：“则林生已涕泗满面，示家信与余观之，凄惨之况，不忍言也”。东京同盟会本部曾于1907年2月3日召开追悼大会，遥致哀悼。刘揆一作《哭炳生弟》诗八首，表达了他在国难家仇交织下的悲愤心情。2月18日，其父又因受刺激，仆地中风而歿。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弟死父亡，刘揆一在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他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在哥老会众人的帮助下，将母亲和妻儿接到东京定居，誓与清廷斗争到底。诚如朱德裳所云：“揆一既遭家变，忧愤几死，且贫困益甚，敝衣粗食，发长数寸，至数钱之淋浴费、烟草费亦不能具，然谋革命益急”。1907年1月7日，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3月1日，又接替宋教仁，代理黄兴庶务之职，成为中国同盟会本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刘揆一担任代理庶务期间，始终顾全大局，竭尽心力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处处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被誉为“革命的道德家”。

综上所述，孙中山、黄兴、刘揆一均不可能出席“孙黄两先生向我等提出办云南杂志”的会议。故，1906年1月，孙中山、黄兴在日本召集同盟会开会和约集云南同志谈《云南》杂志的创刊事宜并发表谈话，显为误记。其实，史学者质疑这次会谈的时间、内容，早有其人。著名者当是《孙中山年谱长编》作者陈锡祺先生，他将此次谈话的时间改注为1906年4月。但主要参与者

黄兴先生于1906年4月在海外组织革命活动的经历为史料所证实，而刘揆一不可能作为同盟会召集人出席此次会议，《孙中山年谱长编》对该文的改注仍不能自圆其说。

误记的情况还有“根源以云南同乡会会长关系，与赵直斋同被推为干事，负责全部工作”一语。《云南》杂志社采用总编辑负责文稿编排事务和经理负责日常事务的制度，保障了云南杂志社得以以近代企业的方式运作，是当时留日学生界地方刊物中坚持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省级刊物。从现存的《云南》杂志影印件来看，《云南》杂志第一号的编辑和发行人是“云南留学生同乡会”。

《云南》杂志第二至五号的编辑为吴琨，发行人为赵伸。《云南》杂志第六号至第十三号的编辑为孙志曾，发行人为赵伸。因为《云南》杂志宣传民族革命的立场，受到日本警察厅的干涉，《云南》杂志第十五至十八号的编辑、发行均改为云南杂志社。《云南》杂志第十九至二十三号对外宣布的编辑、发行人为云南杂志社，实际上是由张耀曾负责编辑、张大义为发行人。^[1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南》杂志社经理赵伸其人，他为了全身心投入到创办《云南》杂志的经营管理，不顾一切地从成城学校退学，成为杂志社唯一的专职人员。留日学生云南同乡会曾于1908年发布通告说：“主持杂志社者为赵君伸，当杂志成立之时，赵君入成城学校已两年余矣。同乡举赵君经理杂志，遂退学成城（学校），牺牲学问，经营一切，热心公益，为留学界中所罕见，此杂志之发达归功赵君孰曰不宜”。

诚然，我们不能苛求年近高龄的李老先生对五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都能丝毫不差地回忆起来。新近发现的云南同乡会的会议记录倒是一个关于《云南》杂志创办过程一个不错的背景材料。云南省图书馆存有刘昌明编辑《云南同乡会第壹次报告》一书，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一日发行（此时为中国阴历，计为1905年5月4日），较为详细地记载了留日学生云南同乡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至一九〇五年五月七日召开的云南同乡会九次例会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会议内容，选举情况等，可作为云南杂志筹办前留日学生云南同乡会实务活动的佐证，报告人为第九次例会干事刘昌明。

云南同乡会第一次开会时间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二日：

开第一次同乡会于牛区诚元町之江戸川亭，午前八时开会十一时散会，到会者由君宗龙，钱君良骏，陈君诒恭三职员，会员到会者刘君昌明、席君聘臣、张君耀曾、李君培之、何君国钧、李君元、杨君振鸿、李君蓴芬，来宾二人，董君恩禄，谌君范模。

.....

同乡会第三次例会兼秋季恩亲会欢迎会，时间为1904年11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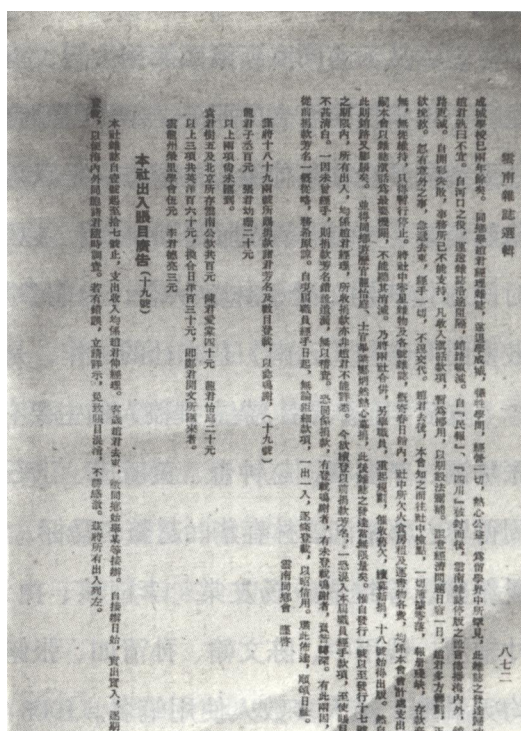
会议同乡会第三次例会兼秋季恩亲会并欢迎直隶游历官朱家宝；本省监督袁君嘉谷暨新会员吴君琨、张君鼎，陆军学生及实业学生诸君。午前九时开会，首由干事由君宗龙述开会词及欢迎词，次朱君家宝、袁君答词，次李君伯庚代表陆军、实业学生诸君答词。十一时更选本会职员，经会员投票公举，张君耀曾为庶务干事，罗君佩金为书记干事，李君燮元为会计干事。同时至宽永寺侧摄影，十二时燕（宴）会，午后一时散会。

同乡会第四次例会兼欢迎会，（时间为1904年12月11日）：

阳历十二月十一日，开同乡例会于神田区锦町锦辉馆，并欢迎孙君光庭及新到会员七人。钱君良骏代干事述开会词。孙君光庭答词。次添选会馆评议员二人，被选者由宗龙、钱君良骏。次提议广劝游学及开办新报事件，次轮班演说，次自由演说。次茶话，午后一时散会。

云南同乡会第九次例会兼欢迎会时间为（1905年）阳历五月七日：

开同乡会第九次例会与谏町区饭田川岸富士见楼并欢迎新会员冈君道。干事刘君昌明首述开会词及欢迎词，次冈君答词，次提议事件报告编译社募捐启稿，次更选本会职员，投票公举席君聘臣、赵君伸为庶务干事，杨君觐东、吴君瑛为书记干事，张君耀曾、杨君与新为会计干事。张君璞、言君道一为招待员。次茶话，午后一时散会。^[11]



郑开文回国后为《云南》杂志募集资金的记录。原载《云南》杂志第十九号

《云南》杂志的出版发行与设立在东京云南同乡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留日学生云南同乡会于1904年12月第四次例会和1905年第九次例会上确定把筹办《编译社》的事项排上工作日程，并确定云南同乡会编译社《略章》：本社由云南同乡会在东同人组织而附属于同乡会之下，名曰云南同乡会编译社。1906年初，在中国同盟会的指导下，助推了工作的快速发展。留日学生云南同乡会确定把筹办的编译社改名为《云南》杂志，其筹办、发行得到了在日本的同盟会员、学生和旅居缅甸、香港、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的云南侨胞，以及滇省官、绅、商、学界、国内各地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大家捐资集股异常踊跃，使杂志社短期内就募得经费万余元，出版发行都非常顺利。以上不厌其烦地引用《云南同乡会第壹次报告》内容，可以说明下面几个问题：

一、云南同乡会从成立之初以“笃厚乡谊，砥砺学行”，逐渐转向参与创办学术期刊，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为己任的团体。与筹办中的编译社一样，“本社由云南同乡会在东同人组织而附属于同乡会之下”，由此推定，《云南》杂志社是留日学生云南同乡会的一块牌子、两个部门。尔后《云

南》杂志因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倾向，数度被日本警察厅责令停业清算，发布通告、通知的署名者均是云南同乡会，足证其隶属关系。

二、“留日学生云南同乡会”设置干事、招待员与会员、名誉会员的管理架构，不设会长的职位。（先为席聘臣）吴琨、赵仲以云南同乡会庶务干事身份主持《云南》杂志社工作，顺理成章。

一九〇六年在日本留学的云南籍学生有二百人之多，所学专业数十个，论资历，学术造诣等翘翘者均大有人在，如吴琨、席聘臣两人，留学前就是新晋进士，其职务是翰林院的庶吉士或编修，他俩的国学深厚为当时云南留日学生之翘楚。革命热情高涨、颇为活跃者如李培元、刘昌明、杨振鸿、吕志伊、罗佩金、郑开文、李伯庚、刘九畴等，并以留日学生云南同乡会的数次会议记录以及云南同乡会会费交纳名单来看，故“根源以担任云南留学生会会长的关系，负责对外联系事宜，赵仲任发行人”一项或为误记。

三、从云南同乡会第四次例会起，担任云南同乡会书记干事罗佩金先生，不再担任同乡会的职务，尔后再没有学习军事的云南留日学生公开担任云南同乡会和其他组织的职务，是以响应同盟会领袖黄兴“积蓄力量，隐蔽行事，专注军事进行”的号召。以李根源传记为线索，他因为那段时间身体病弱，处于休学状态，未能参加日本联队的入伍生训练，故有较多时间参与《云南》杂志社的工作，是个例外。

先后担任《云南》杂志撰稿人的主要有：杨振鸿、吕志伊、赵仲、李根源、张华澜、李燮羲、赵钟奇、黄毓成、丁石僧、言道一、胡正芳、刘钟华、周德容、邓绍湘、林春华、赵鳌、马标、华封祝、闵道、王九龄、张成清、夏绍曾、徐继周、杨友棠、李日垓、由云龙、李华、张鸿翼、李文治、寸辅清、钱用中、陈文翰、孙清如、张佩芬等30余人，大多是同盟会员，均无稿酬，绝大多数人使用笔名。1908年4月，赵仲、孙志曾等人陆续回国参加革命活动，1909年5月，留学日本五年之久的士官学校诸生也相继毕业。导致杂志社的管理层、工作人员发生较大变化。1909年5月起，《云南》杂志的各项工作主要由张耀曾负责，协助他工作的还有刘九畴、张大义、郑开文、李贞白、王毓嵩等，直到停刊。

这些历史线索表明，郑开文始终是《云南》杂志的组织者、参与者，积极的撰稿人之一，也如刘昌明、吕志伊、杨振鸿、罗佩金、刘钟华、李伯庚等人一样，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居于云南同乡会、《云南》杂志社幕后，默默奉献，不为人们所熟知。依据有四：

其一，1909年5月，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肄业期满，云南籍留学生大部分毕业返滇，《云南》杂志总编辑为张耀曾，发行人（经理）为张大义。李根源在1958年出版《云南杂志选辑》序言中写道：“当根源离东京时，《云南杂志》已发行至十八期。总编辑张镕西亦于是时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但对杂志始终负责，并有张大义、郑开文、李贞白、王毓嵩诸君共同支持，其热心毅力真不可及也。”^[12]郑开文与李根源等人同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其时已返回国内，并担任广西右江部队的管带（营长）和南宁陆军讲武堂军事教官。但对远在日本东京的《云南》杂志却始终负责，并赶赴京参加回国留学生考试的机会，坚持不懈地为《云南》杂志奔走呼号，向国内社会各界募集资金并扩大《云南》杂志在国内的影响。仅《云南》杂志“本社出入账目广告”：“收郑君开文日洋壹百叁拾元”^[13]等记载，就有数笔款项来源于郑开文在国内的募集，是嗷嗷待哺的《云南》杂志赓续出版发行第十九至二十三期的资金来源之一。同时，他的不懈努力也成为身处

困境的《云南》杂志社编辑人员的激励之源。想想也是啊，异国他乡寒窗五度，历经磨难，终于学成归来。留洋镀金的军官可是那些想办新军的都督们的抢手货，高官厚禄唾手可得，儿女亲情就在此时，谁还有精力顾及远在日本东京的《云南》杂志，有多少人的心思还搁放在曾经的许诺上。唯独郑开文，放着高官厚禄的大好机会不知把握，却自掏腰包，北上南下，跑衙门串府宅，向达官贵人说项求情，只为了一句“始终负责”的诺言，这真是傻到可爱。俗话说，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女，谁能会那么倾心尽意的哺养照顾，“始终负责”的诺言和源源流向东京《云南》杂志社的汇款单佐证了郑开文对《云南》杂志视为己出的深厚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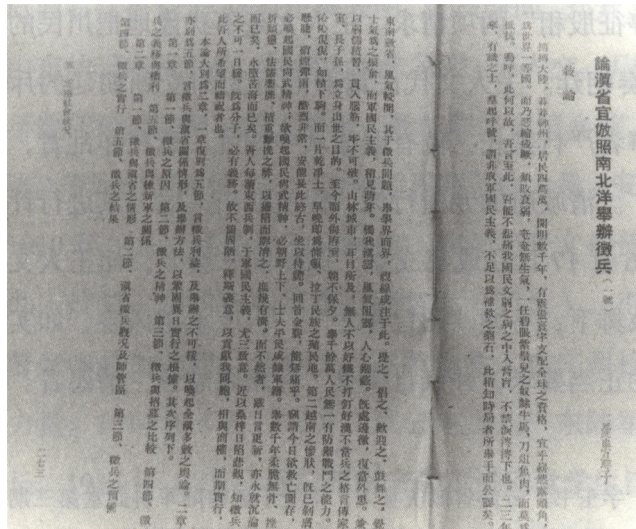
郑开文劝募的对象都有谁？名单罗列出来就可知他走访的官绅要员与大致的活动线路。龙君子丞百元（龙子丞为龙济光，时任广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张君幼珊二十元（张幼珊，其人则不见经传）。袁君树五及北京所存云南公款共百元（袁树五为袁嘉谷，云南第一个科举（经济特科）状元，时任浙江省提学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陈爱棠四十元（陈爱棠，又名陈曼堂，云南弥勒县虹溪镇人，清末云南著名富商，北京、武汉、上海等地天顺祥钱庄掌柜）。龙君怡庭捐二十元（龙怡庭为龙觐光，时任广西右江提督）。还有记载表明，此段时间，郑开文曾向北京、四川、安徽、山东的云南籍高官、封疆大吏朱家宝、王人文、丁槐、丁振铎（1902~1906年曾任云贵都督）等人募捐，趁机联络乡情乡谊，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争取他们同情革命，为尔后积蓄革命力量、安插同志作了很好的铺垫。1910年3月，蔡锷调动桂林前，推荐郑开文接任广西南宁陆军讲武堂总办（校长）和广西陆军模范团督办（团长），得到提督龙济光、两广总督张鸣岐的首肯，此举保存了革命党人在广西桂林、南宁、龙州等地的力量。1914年5月，郑开文从云南进入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担任代理旅长。1914年11月，原广西南宁陆军讲武堂学生江映枢、云南陆军讲武堂学生孙明^[14]等人得任广西陆军第一师炮兵团副团长、第二混成旅参谋等人事安排的运作，把远在广东的滇籍军队纳入革命党人势力范围，为促成护国战争中广东的独立布下先着，显然有郑开文利用与龙济光、龙觐光、张鸣岐、朱家宝、王人文等封疆大吏的官场关系、人脉资源的痕迹。

与郑开文在国内为《云南》杂志联系募捐、宣传民族民主革命主张有关联的还有一件事。“赵仲君归国后，张大义诸君复有中兴《云南》杂志之举，得王采臣先生由川汇捐一千元，其他各同乡捐助者亦复不少。正继续出版，适遇光复之事，留东各同学急于回国效力，苦无路资，故将此项捐款拨为费用。”^[15]这里提到的王采臣，其大名为王人文，字采臣，又字豹君。云南大理人，白族。在清末民初，王人文则赫赫有名。王人文于光绪十三年（1883年）癸未科进士，官至四川省布政使，在四川“护路运动”风潮激荡的1911年以布政使的身份护理“四川总督”职务。1911年6月1日，盛宣怀致电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传达满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方案。四川民众得知“上谕”后，反抗情绪激烈，提出“暂不接收铁路（国有化）”及“暂缓公布停征股租”两项请求。王人文毫不犹豫地吧川民的两项合理要求，迅速电奏朝廷。王人文代民请奏的行为却受到朝廷的斥责，清政府要他“对生事者严行禁止，倘有匪徒从中煽乱，意在作乱者，照惩治乱党例格杀勿论”。清政府的专横行为，促使四川人民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11年6月17日在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而王人文在民众“保路”精神的鼓舞下，不顾“诏旨斥之”，再度承担风险，如实地再次向清廷反映川民的正当要求，并亲自接见“保路同志会”请愿者。他当场向大家表示：“对涉及国计民生的人事，他职责攸关，保证据理力争。”他以属地利益受损没有得到合理补偿为理由，明

里暗里支持四川官绅市民反对地方铁路收回国有，直接演变为轰轰烈烈的四川护路运动。

在清政府调动军队来川镇压时，后方空虚的湖北革命党人趁机发动了辛亥武昌起义。由此看来，史学家把点燃辛亥革命导火索的首功划在王人文的头上，多少有点道理。辛亥革命后，王人文曾被武昌军督府誉为四川革命的“八大功臣之一”，被创建的中国国民党选为常委之一，佐证了王人文点燃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功绩。

其二，1906年10月发行《云南》杂志第一号（创刊号），郑开文以“忧患馥子”笔名发表《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和时评《英法军事协约问题》两篇文章。



郑开文以“忧患馥子”笔名发表于《云南》杂志创刊号的《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文章。

《云南》杂志的编辑、撰述人员，表现为分工合作、协同作战、术有专攻的特点。如吕志伊，笔名侠少，专门从事政治、法律方面的撰述，有《云南之将来》《英国之亚洲铁路政策》《滇缅疆界谈判》《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国民主义》《国民的国家》等文章刊载，这与他日本弘文学院、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肄业的专业非常贴近。殷承璈，笔名迤南少年生、击椎生，对云南乡土文化有深厚情感和研究，有《爱滇篇》《滇南诗话》等著述。杨振鸿，笔名志复，专以揭露法国殖民者以划界为由蚕食云南疆域的事实，有《滇缅界事述略》《法国人窥伺云南之渐》《滇越边务及铁道之实况》《法国人探险及图谋云南之早期》《办理盖达案件述略》等著述，这与他多次在滇西边境组织武装起义的活动有关。赵仲，笔名直斋、死灰、雄飞，致力于唤醒云南国民，着重于云南清政府官员贪腐问题的披露，有《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腥风血雨录》《安南人种之调查》等论著、编述。留学生赵仲说：“国将亡，则凡世界上已亡国之一切惨状，皆将备受之。然则搜罗世界上已亡国之一切惨状，录为一集，以贡献之于将亡国民，固亦吾人义务之所不容已也。”此外，志复撰写《滇缅界事述略》、直斋撰写《腥风血雨录》、越南巢南子（潘佩珠）撰写《哀越吊滇》、梦魔撰《军人与国家》、安南本社特派员来函《法领安南军队之组织及其概况》《安南惨状一节》等文章，均刊登法国占领安南之人头博览会、法国殖民者对越南人民的迫害等图片、照片，揭露法英帝国主义虐待越、缅人民的惨状。李根源，笔名雪生、高黎贡，担任过杂志社干事、总干事，则着重于国际形势、云南传统文化的著述，是云南杂志第2-15期的大事月表、大事编记的编辑，有《法人与云南》《瀛谈片片》《腾越关之商务》《永昌府属历史上之遗迹》《云南之土司》《金碧遗征》《昆海遗征》《滇南诗萃》等撰述、著作等文章刊载。张耀曾，笔名崇实，毕业于日本东京帝

国大学法学专业，有《云南人之责任》《云南人之民气》《论云南之社会智识》《欧美公德美谈》《说权利》《云南少年之前途》《国民能力与国家进步之关系》等论著发表，显然与他的法学专业有关联。张耀曾《云南之将来》一文明确指出：“勿蹈安南覆辙，缅甸后尘，而勉为美利坚十三州之一，撞自由钟于华岭，树独立旗于点苍”，对挽救民族危亡充满了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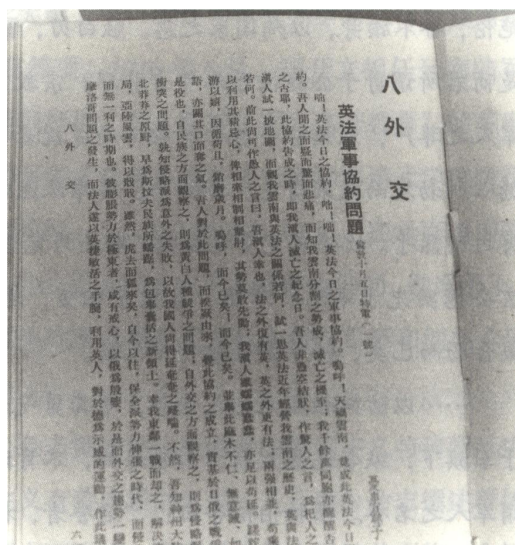
郑开文，笔名忧患馀子、鲁戈，则针对清王朝在军事上的军制落后和军备废弛的两个方面予以抨击，从建立近代军队的必要性、编练新军和军事教育等方面撰文，介绍国外先进军事思想、军事技术和治军理论，立足于开展军事抗争的鼓动。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传播对郑开文等人军事思想的形成曾产生重要影响。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拿破仑、须宾华（今译叔本华）、怯物伯伦奇、格劳秀斯（今译克劳塞维茨）等哲学家、军事思想家对于民族、国民、战争等问题做过不同的解释，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普遍把这些军事思想作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榜样和依据。这些内容在《云南》杂志中均有反映，时常能见到多位作者引用拿破仑等一些西方军事家关于国家、民族主义、国民与军事的概念，以及其相互依存关系的论述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如郑开文在《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文章中深情呼唤：“搏搏（博博）大陆，莽莽神州，居民四万万，开明数千年。有震荡寰宇、支配全球之资格，宜乎崭露头角，为世界一等国。而乃瑟缩疲蹶，颓败衰弱，奄奄无生气，一任碧眼紫须儿之奴隶牛马，刀俎鱼肉，而莫为抵抗。呜呼，此何以故。吾言至此吾能不悲痛我国民文弱之病之中人膏肓，不禁泪涔涔下也。二三年来，有识之士，群起呼号，谓非取国民主义，不足以为补救之药石，此稍知时局者所举手而公认矣。”同时，郑开文还引用、评述已沦为他国附庸的殖民地、战败国如朝鲜、安南、缅甸、埃及的历史事实，大肆宣传美、德、日等国尤其是日本的独立战争史，以惊醒国人，鼓舞国人奋发图强的自信心，激发民族主义思想，讴歌不屈不挠的国民、军人齐心协力抗争外部侵略的事例。

郑开文与其他《云南》杂志编辑、撰述员同声呼应，鼓吹军人、国民应具备不屈不挠、永不服输的精神，例如，以“记者”署名的《南阿战记》一文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叙述了杜兰斯瓦的存国史。杜兰斯瓦今译德兰士瓦（现在是南非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地点约为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带。所谓的布尔人，指的是荷兰人和德国人在非洲土生土长的混血后裔，他们和英国的战争很早就开始了。英布战争（1899年~1902年），也称南非战争，是英国与布尔人双方为争夺南非领土和地下资源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布尔人实力还不及中国一个府，却跟英国人打了三年仗，尽管输了，却不丢人。革命党先驱者陈天华著《猛回头》里曾经提到过，说那是个小小的民主国，地方有中国数府大，人口却不及中国一县，盛产金矿。郑开文评述认为，如此不起眼的一个小国却能保存国土，就是因为其国军民有着不屈不挠、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精神乃是“一切名誉，一切成败利钝，以徇其一往之武断。而逆天逆时势以为之，为之而败，败又为之，再败、三败至于百败而为之也如故；我身不成，我友为之，我友不成，我友之友为之；我不成子为之，子不成孙为之；一次不成，两次为之，若犹不成，至于十次百次为之；今年不成，明年为之，若犹不成，至于十年百年为之……终不能以再败三败乃至百败之巨创深痛而屈服之”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是“视犯难进取，争独立、争自由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离；视刀锯鼎镬之下、枪林弹雨之中为我生最得其所之地，而以成败利钝如浮云之过目”的为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的献身精神。

布尔战争同时期的中国，正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清军和布尔人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鼎盛辉煌时期的英军，在南非被弱小的布尔人打败，被布尔人的游击战打得肝胆俱裂。而满清政府几十万清军却被数千人的八国联军打的丢盔弃甲，最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比较之下，要改变云南“铁路失矣，纸币流行，财政上之平准权又失矣，军事被人干涉，官吏为虎作伥，利权拱手奉贼，江山无人作主”的现状，唯有与杜兰斯硅共志其志，奋起而战，将保家卫国的希望“诉之于战争”，以云南“千二百万人尽亡”的精神当之。劝励国人千万不要像“不耐一败”“甘为牛马之生活而不愿为人道之战争”的埃及、缅甸、安南那样“人奄奄无生气，如牛马然，当牧缰辔之外，决不思天地间更有衣冠饮食事也，负重涉远之外决不思天地间更有车马仆从事”，否则云南就是“真亡了”。

郑开文从军事角度上论述，云南之所以敌不过英、法帝国主义的缘故主要有四：“一是教育不发达，人民无国民的观念。二是军事不发达，军人无军人的资格（国家的衰败首先是军队的衰败，外电鄙视云南军队，称云南有乞丐，无军人）。三是实业不发达，财政问题很觉穷迫。四是滇越铁路尚未赎回，滇蜀铁路、腾越铁路又未曾兴工”。这四件事中，以铁路、军事为最要紧。铁路赎回了，则云南的主权就不会丧失，这是云南得以不亡的基本条件。精壮陆军练成了，凭借云南的奇险地势，可以在军事上尽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利，这是云南能够不亡的重要保证。然而，仅靠云南一省是无法做成这两件事的，因此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共同筹资保云南，只有云南“无恙”，四川、贵州、两广才可“无恙”，腹地各行省才可“安枕无忧”；只有云南未被英、法占领，扬子江流域、黄河流域与福建、陕、甘各省才可“保全”。

郑开文论述，处在世界万国残酷竞争的丛林时代，军队除了对内保有统治权外，对外还当持有独立权、平等权和自卫权，乃使国家在国际外交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国家无独立权，则国民将依人篱下，窥人鼻息，遑遑如丧家之犬而无以自立。……国家无平等权，则国民虽为优秀之民族，亦成为恶劣之贱种，以侪于红夷黑蛮之列而无以自保。……国家无自卫权，则国民将日处于刀锯鼎镬之下，奴隶任人，牛马任人，解剖任人，烹割任人而无以自存”，并以亡国之犹太、波兰、土耳其、波斯、朝鲜、埃及、印度、缅甸、越南为例，以惊醒、激发国人的国家意识和竞争意识。



郑开文以“忧患馀子”笔名在《云南》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时评《英法军事协约问题》

从《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和《英法军事协约问题》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郑开文早期军事教育的思想萌芽：“军人爱国精神、军人的公德心（郑开文当时定义军人公德为：以个人对于团体负当尽之责任者为公德；牺牲一身以保全体者为公德）、军人名誉教育优先于军事技术、学术教育”等，并且这个思想理念一直在郑开文后期的军事实践、军事教育的生涯中时有显现。如郑开文在《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之关于“征兵之精神”曰：

（甲）关于爱国上之精神：国家学之言曰：国家者积个人而成者也。故国际（家）之荣辱存亡，与个人有休戚之关系。况军人者负直接保国之义务者也。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譬之个人之于家也，苟有毁其家者，必舍身而争之。奚以故？曰，以爱之深故。如妇孺之于子也，苟有危其子者，必拼命而救之。奚以故？曰，亦以爱之深故，有此感情之观念，以相维系，遂一如切肤之痛，连体之忧者。军人之与国家，有以异乎？无以异也。司马法曰：“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视国事如泰山，视身家如鸿毛。苟利于国，虽死亦荣；苟害于国，虽生亦辱。以此精诚，以此义烈，郁之即为国魂，张之即为国威。此中妙用，吾不知其竭几许能力，灌几许热血，酝酿胚胎，而成此心照汗青，河岳生色，可钦可敬可歌可泣之概念。

夫国无魂不立，国魂者国之所赖以为国。苟无爱国之精神，即无立国之国魂。既无国魂，安问国威。若是者，吾知其虽拥百万之众，亦终无士气振奋之一日。谓之无一兵焉可也，谓之无一人焉可也。其结果必溃败衰微，有不可究诘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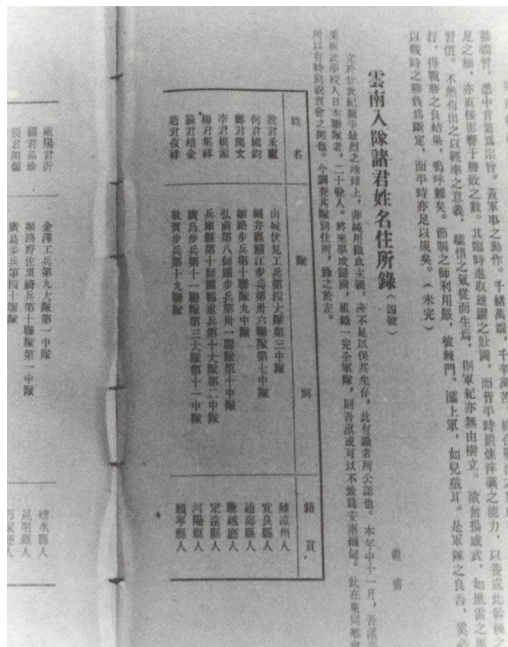
（乙）关于公德上之精神：……及一朝有事，誓于军旗之下，则武勇绝伦，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触白刃，冒飞血，冲锋挫敌，视死如归。是商君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者非耶；宗教家所谓以死助同胞者非耶。是军人之尊严，未始非公德心所维持而成就者也，军人之光荣，亦未始非公德心所勃发而效果者也。公德乎，其军队组织之原（元）素乎，其军队教育之利器乎。故必有完全之公德，斯足为完全之军队。言军队必始于公德，言公德实先于军队。不然，虽壁垒相望，连营千里，亦不过乌合无赖之集合场而已矣，终于丧乱败衅而已矣。

……以防御祖国为己之任务，率其勇气豪胆，守之以一死。一旦宣誓于军旗下，纵令地落天崩，山裂海倒，不肯退一步。立处即死所也，是之谓军人之名誉。怯物伯伦夺曰：“名誉者，树伟业之机轴也、之动机也，军人生活之精神也。无恐怖，无怨嗟，无伪无骄，与职分共毙之精神也。”

……夫保存国家之名誉者为军人。军人之名誉，奚啻国家之名誉。名誉之丧失，即国威之堕落。噫！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即肝脑涂地，亦无最后之降服。彼执侵略政策吞噬手段者，吾知其必闻风而靡，为三舍之退避；而狼子野心，亦归于消灭矣。^[16]

纵观中国辛亥革命前后十年，各类报纸杂志发表文章洋洋以数千计，《云南》杂志发表各类文章也有数百篇。但论述军事、军事教育以“爱国、公德心（责任）、名誉”为先导者，并在尔后十多年的时间内，始终坚持其信念不变者，仅郑开文一人而已，实是开创了中国同盟会诸君研究军事教育的先河。例如，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元月9日成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郑开文即担任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并筹办中华民国第一所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其主持制定的《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和《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学大纲》中，就首列军校办学的宗旨有爱国精神、军人精神，军人名誉教育等项。1916年6月，郑开文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后，仍然

以“爱国精神、军人精神，军人名誉教育”的军事教育方针，亲自制定《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暂行内务细则》，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至1920年9月13日，在云南靖国联军警卫军成立大会上，郑开文乃以爱国护法的军人精神为训词，勉励部下。可见，上述军事教育理念的源头均来自郑开文在日本留学军事和创办《云南》杂志期间的学习与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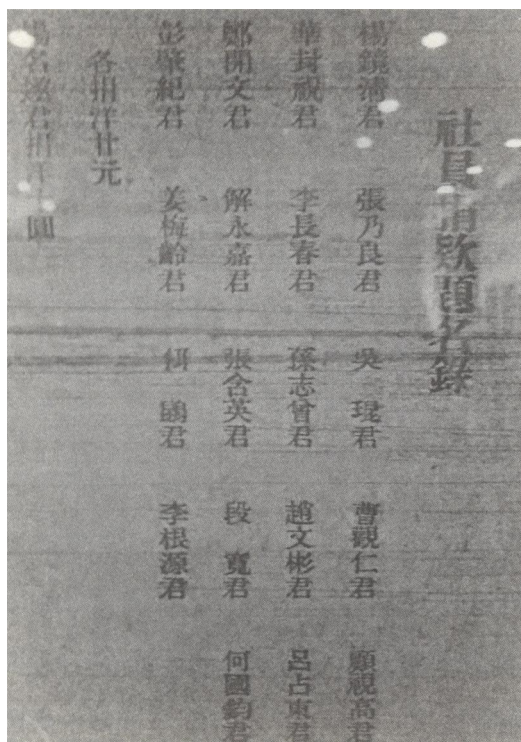


《云南》杂志第四号刊登郑开文等从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入日本姬路步兵联队九中队见习的消息。

需要指出的是，《云南》杂志撰述群体所倡导的爱国主义与清朝廷中一些开明士绅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云南》杂志撰述群体所倡导的爱国主义基于如下观点而形成：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共有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对国家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因此人民爱自己的祖国而生发出爱国主义。与此大相径庭的是清朝官员以及朝廷中一些开明士绅，把国家包括他们自己看作是君主的私有物，即“君临天下”，作为臣民他们要忠君，由忠君而发展到热爱君主的一切，包括君主的天下。也就是说，他们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植根于“忠君”观念。如，云南开明官员陈荣昌奉旨去日本进行学务考察，其撰文呼吁云南人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思想，革除弊政等，重申爱国之意，但是其本意还是忠君爱国，说：“吾与树五、伯贞及留学诸君与吾滇父老子弟皆大清国民也，安得不师此意以忠君爱国，断足而不悔耶”。虽是隐晦虚饰的无奈之语，但是对国家的表达不能说是清晰的，与《云南》杂志诸君所倡导的国家、爱国主义等概念不是一回事。

其三，当时云南革命党人在东京所刊登的文章报道也提供了线索，载于云南杂志第四号、赵伸撰《云南入队诸君姓名住所录》，报道了在振武学校学习军事的云南同学毕业后进入日本联队实习的消息，并感言道：“立于廿世纪竞争最烈之地球上，非纯用铁血主义，决不足以保其生存，此有识者所公认也。本年(1906)中十一月，吾滇卒業振武学校入日本联队者，二十余人。将来学成归国，组织一完全军队，则吾滇或可以不致为安南、缅甸，此在东（京）同乡会所以有特别祝贺会之开也。”清末时期，文章图表中的排名，会议、接见、宴请的座次都很讲究尊长上下的礼仪，表现出当时代的社会、官场的秩序、礼节。表中前面“殷承瓚、何国钧”两人为士官学校第五期学生，其后23人均士官学校第六期学生，并以郑开文、李根源排列在前。当时李根源为云南杂

志社干事，若不是特殊的原因，把郑开文排名于前是不合常规的。估计也不是年龄的关系，比如张开儒就比郑大七岁，李敏也比郑大五岁。无独有偶，最新发现在日本东京刊发《滇话》杂志宙字号（第六期，也是终刊号）封面文章《云南陆军学生卒業報告》，也以郑开文为士官学校毕业生首位。一般说来，不同时期、不同的编辑人员将同一人放在名单的首位，彰显其身份或者影响，这不能说是一种随意或偶然吧。



郑开文 1907 年参与日本东京《滇话》杂志的组织、捐款工作名单（云南省图书馆史料，缩微胶片）

其四，郑开文行文赋辞有较为固定的遣词造句的模式，举事论证比较详尽，甚至时有说过头的感觉。仅举一文为例，其遣词造句就非常近似。刊载于 1919 年 10 月 20 日上海《申报》题为《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致军政府各总裁、参众两院电》：

（衔略）：窃维西南各省迭次举义，一则曰护国，再则曰护法。夫护国则使国不分裂，护法则必使法不沉冥，乃二者俱不可得，姑出于划疆独立。既独立矣，即应有独立精神、独立能力，一方面统一军政，一方面整理民政，务使军实充足，民气发扬，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虽不敢云雄视列强，亦不致为列强所侮，斯不负首义诸公之苦心。然欲达以上之希望，非选举正式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不为功。乃自举义以来，徒拥一军政府之虚名，环视各方面，军政不统一，民政不整理，较未举义以前，尤有甚焉。群龙无首，其吉安在？况又为北方所哈，今日议和，明日议和，无论和议骤难告成，就令告成，彼北庭对于西南要人，其能推诚相与，畀以海陆军权、财政权、外交权乎？窃敢谓所畀者，教育部、司法部等总次长，使之循例画诺，委蛇耳，伴食耳。我首义诸公，虽有统一军政、整理民政之心，何由展布？且北庭以前所借外债，不下数千万元，其债务之履行，将令北方诸省担任乎？抑由南北平均担任乎？由北方担任万万无此办法，若平均担任，又非民情所甘。且和议告成后，大权在握，并将大借外债，以多数入彼私囊，以少数购买军实，以为防御南方之计划。我南方诸省将永久屈服于北庭，而债务之履行，亦永无纪极。虽然力能履

行，尤可说也。内顾民生，凋敝已甚，而外人之追呼，亦日甚一日，亡国相去不一间，此可为痛苦者也。开文武人，本不应干预大政，然而栋折榱崩，被压惟均，故不揣冒昧，妄参末议。务恳俯赐采纳，迅将选举正式总统、组织正式政府问题，立为解决，不胜待命之至。^[17]

此电文从当时护法运动的实际状况，详细列举北洋政府在举借外债和南北议和等方面对广州军政府的打压，以及革命政权与北洋政府的不可调和性，力主选举孙中山为正式大总统并组织正式政府，在舆论上维护孙中山先生在护法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此电文与《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和《英法军事协约问题》两篇文章中举事论证、条缕剖析的行文风格相当一致，是郑开文一贯秉持的文章特色，也是郑开文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党人很少涉及军事教育领域的一个突出点。

考察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的报章、杂志、各类图书和小册子，应该承认，革命党人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常言说：“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一支笔，能抵三千毛瑟枪。”晚清的这些在日本东京等地编辑发行的报纸杂志对于转移人心，形成舆论，推动革命高潮到来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创办《云南》杂志的经历，使郑开文深刻体会到舆论宣传揭露封建清政府腐败没落的本质，在鼓动群众进行革命的活动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为他在今后的革命实践活动中，特别是革命运动的关键时刻，屡屡展布其对时局的看法和评论，契合当时革命运动的斗争策略，发动政治宣传、大打舆论战，为当时革命运动代言，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第四节 在日本联队的两次军事实习与历练

日本维新变革，特别是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国力增强，民气大振，自信心膨胀，普通日本老百姓是很看不起中国人的，通常认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知识落后，人品猥琐。其实，能够去日本留学的大多数中国人，无论从学识、体格、相貌、精神状态都可以说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大国的精英群体，知识水平多数是秀才、附生，举人，甚至还有进士。他们面容清秀，举止文雅，思想新潮，为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所表现出的执着、热情和振奋上进的精神面貌给日本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年龄最长的云南留学生周霞为例，周先生于1904年留学日本时已满62岁，他“双目炯炯如箕，长眉，美须髯，秃发。服西式学生衣冠，气益豪，日人咸颂之曰丈夫”，其坐落在课堂里，精神抖擞，一丝不苟的听课，做笔记，如饥似渴的学习态度，感人至深。不但日本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宣传其人其事，得到日本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荣誉。还受到东西方学者的青睐，争得小影，以策后进。日本学界亦评价说：像云南省派来的某人，以届七十岁左右高龄，但每能凌驾年轻人，一派天真，热忱担任班长的工作。

以郑开文个人的条件来看，有着许多常人所没有的特质。他身材高大，有近一米八五的个子，目光炯炯，站立、走路都是腰板挺直，目不斜视，气宇轩昂，给人以职业军人的印象。上课学习，往往是神情专注，认真听课、做笔记，由于青少年时期的博闻强记的学习习惯，各门功课都能顺利过关。军事操练和各项军事科目更是一丝不苟，得到日本军事教官的由衷赞赏，这在以严格、魔鬼训练著称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不多见的。

郑开文在日本留学的五年内，曾两次到日本联队当兵实习，可谓深入狼穴，历经磨难，取得日本军队指挥系统的架构、日常训练、士兵的思想状态等第一手珍贵材料，为“师夷而制夷”积累了丰富知识。

第一次是1906年11月由日本振武学校毕业，进入姬路步兵第十联队第九中队，当兵六个月，以获得入伍生的资格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郑开文于1907年5月顺利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一年半期满后，再次进入日本联队做实习士官5个月，各门军事科目成绩合格，从日本士官学校正式毕业。郑开文毕业实习的地点是日本名古屋第三十三联队第十中队，时间是1908年12月—1909年4月。



郑开文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的毕业照。（源自《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谱》，懋勤轩三迤掌故之藏品，石智文提供）

在日本军队里，当个“低等兵、实习官佐”，在那个时代是件不可思议的历险。日本国军队的特色可以归纳为：一、绝对的服从，二、超越人体生理极限的操练、野外生存训练，三、武士道精神的灌输、非人道的天皇至上的献身说教。日本人的军事训练方式和严格的军纪，留学生们早已在振武学校就领教够了，但是在日本军营里，日本人的军事训练、军规纪律的严酷更是达到了极致。超强度和严酷训练本无可厚非，但在日本民族的性格里，不管什么事情都往往会做到极致、极端，时时透露出一丝疯狂的味道。日本国崇尚武力，以铁血政策支撑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历次对国内的军事征伐和对亚洲邻国的侵略，都是以其强悍的军事实力为基础的。日本军界对士兵灌输武士道精神，目的直接明了，强军黜武就是为了战争。军队训练的一切工作出发点就是提高士兵的实战能力和生存能力，今天在训练时多流一滴汗，战场上会少流一滴血，这就是日本军人训练的信条，贯穿在日本军队的日常生活、训练的每一天。

首先是早晨早起，联队规定每天早晨五点钟即起身，起床后便自己拿脸盆到井边提取冷水洗脸。这是日本民族生活的一个特点，不仅部队如此，全民族都是这样，并且早晚各一次。为了锻炼身体，平时用冷水洗澡，冬天用雪满身擦拭，然后跳进砸开冰窟的河里洗澡，这不仅锻炼了身体，还锻炼了人们的意志，使人精神焕发，头脑清醒。名古屋位于日本的豪雪地带，一到冬天就大雪纷飞，积雪经常达2-3米厚，整个城市都覆盖在冰雪之下。郑开文正是1908年的寒冬腊月进入日本名古屋陆军第三十三联队第十中队实习，用冷水、冰雪洗脸洗澡，吃冰硬的食品，更是军队野外生存训练的必备科目，但是对于一个生长在中国南方的中年男子来说，其艰苦磨砺程度可

想而知。

早晨洗脸之后，就有官长带领士兵去马厩护理马匹。擦洗马匹和爱护骡马是野战部队官兵每天的重要科目之一，擦马必须从马蹄、马腿依次擦到马背，再从马背、马头一直擦到马尾，用禾草对马的每一个关节、肌肉进行尽力摩擦，一直到马匹浑身发热，血脉流通为止。然后将马匹牵到外面，饮水喂料。等马匹饮食完，才能回营房吃早饭。傍晚时还需到马厩再擦一次马，然后才能回去吃晚饭。平素对骡马也十分爱护，每当骡马外出运输时，走了一段路程以后，就必须放下驮载物，放松马肚带，休息片刻，让其恢复体力。

节制饮食也是日本军队生活的一大特点，以此来训练士兵“对于事物的一种忍耐功夫，并且和社会教育、精神教育有其共通性。”日本军队当时的伙食十分粗粝，并须节制饮食。规定每人每餐只能吃一中碗米饭，每星期还要吃几餐麦饭。菜蔬十分简单，经常是两片萝卜干或一片咸鱼，只有星期天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这可把郑开文害惨了，他身材魁梧，体格强健，体能消耗要比一般人大很多，饭量自然比较大些，连饭都吃不饱，更遑论营养多寡，自是时时都感到饥饿。但也没有办法，联队规定是不能随便出营房买食物的，只有早晚才能到军营的俱乐部买些饼干充饥。可恨的是，买饼干还有一定的限制，规定一人最多只能买几片，去迟了就买不到。

日本军队的又一特点就是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郑开文在姬路第十联队实习的身份是二等兵，资格很低，上面还有上等兵、下士、中士、曹长、特务长，特务长以上还有正式军官。这许多军官、士曹，一级一级的管着，新兵必须替老兵洗衣服，擦鞋、补衣服，二等兵必须接受上等兵的差遣和使唤。这几乎是日本军队的传统，要成为军官，必须要通过这一关。当然，郑开文他们是清朝派遣的留学生，未必要像日本士兵那样必须接受上司的当差使唤，洗衣服，擦皮鞋等等。但是在许多场合下，一些日本军官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其优越感和傲慢，索取低等士兵的服务，中国留学生也不能例外。如果不达目的就会在平时操练或训练中故意刁难、打击报复。云南留学生李鸿祥就因此被日本曹长罚跑操场 50 圈，中途不准停下，跑不完不准吃饭，成为陆军上将李鸿祥先生耿耿难忘一辈子的经历。

对郑开文影响最深的，还有日本军队中的尚武精神灌输和军人精神的塑造。日本军队中盛行“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所有的官兵把服从国家命令视为军人的天职，严守纪律，执行命令是军人的第一要务。这使他深刻体会到政治训练和内心信仰的重要，凡是一个军队的官兵能够勇敢坚强，其实就是严格军事教育的贯彻执行和对于政治伦理、思想理念的灌输、培养程度相结合的结果。

- [1] 《清光绪实录》四百〇五卷。转载自“国学大师网”《清光绪实录》网络版。
- [2]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转载自周立英著《晚清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第37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 [3]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转载自周立英著《晚清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第37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 [4] 程潜著《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段》转载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7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4月。
- [5] 李书城著《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转载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8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
- [6]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第28-3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
- [7] 社员编辑《云南同乡会第四十一次例会兼欢迎会李巽如女士演讲》，日本东京出版发行《滇话》第二号，第47页。（云南省图书馆史料，《滇话》杂志缩微胶片）
- [8] 李根源撰《云南杂志选辑序》，转载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第1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11月。
- [9] 章开源 罗福惠 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第17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09。
- [10] 留日学生云南同乡会编辑发行《云南》杂志，影印件。（云南省图书馆史料）
- [11] 《云南同乡会第壹次报告》，编辑主任：云南同乡会庶务干事刘昌明，东京云南同乡会编辑发行，1905年。（未公开发行，云南省图书馆馆藏。）
- [12] 李根源撰《云南杂志选辑序》，转载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第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11月。
- [13] 《云南》杂志“本社出入账目广告”，转载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第87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11月。
- [14] 孙明(1889—1959)，字玉书，云南省鹤庆县人。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特别班，1915年任广东陆军第二混成旅参谋，1919年任驻粤滇军第四师参谋长。
- [15] 唐允仪撰《创办云南杂志意见书》，转载自《天南新报》，1913年3月26日。（云南省图书馆史料，《天南新报》缩微胶片）
- [16] 忧患馀子（郑开文笔名）撰《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原载《云南》杂志第一号。本文转摘自《云南杂志选辑》第278~280页。
- [17] 《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致军政府各总裁、参众两院电》原载《申报》1919年10月20日。本文转载自桑兵主编、谷小水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五卷），第1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